

WORLD ALPHAS

我的老师

第二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我的老师李恩波先生	王世强(1)
我最尊敬的徐老师	冯铁城(5)
写作的启蒙者	
——忆我的小学语文教师	石 英(9)
感谢我启蒙之师	丘质樸(13)
我心灵的指路人	丛心泉(16)
我中学时代的吴爱育老师	印重佑(22)
回忆我的两位老师	刘清涌(28)
给我的中学老师拜年	刘绍棠(32)
我的老师们	刘镜芙(36)
记良师益友陈小二	刘传昆(43)
晚霞红似火	
——记热爱老年教育事业的高仲楹老师	李子忠(47)
热诚扶掖青年的导师	
——回忆卓炯老师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李江帆(50)
“离开孩子们实在没法过……”	
——拜访 40 年前的启蒙老师	李士非(57)
兄长般的老师	李治平(60)
我的启蒙老师朱秀清	李怀林(66)

忘不了的一课	岑 桑(70)
沥血的讲台	陆 机(73)
师魂	
——记我的老师黄仁春	余培金(77)
严师	陈小茶(82)
五月的鲜花	肖复兴(84)
高山景行	
——深切怀念王起老师	林受之(88)
“实事求是”责在一个“实”字	
——回忆我的启蒙老师甄求实	张克让(93)
毅力的源泉	
——回忆吕绍宾恩师给我的铭心教诲	张兴旺(98)
记我的老师王熙年	张国良(104)
我的老师	周桐淦(108)
马校长,您在何方?	赵 寰(111)
永不忘怀恩师	夜佳声(114)
铃兰	
——记高源老师	贾荫春(117)
梁劲夫老师给我的人生启迪	徐 亮(120)
师生情深	梁志鹏(123)
教坛引路人	
——记我的老师丁有宽	唐丽云(128)
记裕仕先生循循善诱二三事	康昆煥(134)
我所认识的钟敬文老师	黄秋耘(139)
我的革命启蒙老师吴章彬	黄德芬(144)
我敬爱的两位老师	黄开南(147)
海粟大师 风范永存	黄笃维(151)

师恩如海	彭伯初(154)
我可敬可爱的老师王履胜	曾继宋(158)
我最难忘的两位老师	谢子其(161)
回忆我的老师夏锡玲	谢子轩(164)
解不开的情结	
——忆吴组缙师	裴 斐(167)
师恩难忘	蔡运桂(172)
后记	编 者(175)

我的老师李恩波先生

王 世 强

1944年，我考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那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在抗日战争时西迁而建立的）。入学不久，就听说数学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李恩波教授。那时数学系还有张德馨、张世勋等教授，他们都是系里的台柱，每人讲授多种课程，工作很重。那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困难，教授们粗茶淡饭，和师生员工们一起住在学校附近的简陋平房里。

李恩波教授字宇涵，河北遵化人，早年在北京师大毕业，曾在师大附中任教，1936年去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留学，于1940年获博士学位。然后应聘回国，辗转到了抗战后方的陕西城固，不久又随学校迁来兰州。

1945年我上二年级时，李老师给我们讲授“高等微积分”课（其内容相当于现在“数学分析”课中的理论部分）。当时是用熊庆来著的《高等算学分析》做教材；但李老师讲课时并不是不费事地按书讲解，而是既不脱离书中主线，又相对独立地着重讲授一些重点、难点，如 Dedekind 分划、微分概念、隐函数定理等等。这种讲法，使得在一年级学“初等微积分”时只注意按公式

计算和解题而不太注意概念和理论的我受到很大启发，开始注意学习数学中概念严密的理论思维和论证。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数学学习中，正是在李老师的启蒙下，才开始了解分析数学中一些理论性内容，并由此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学习分析数学理论的基础。

李老师身体不好，听说是由于从德国回国后，乘大卡车路经云南一带的高山峻岭时途中摔伤，受到严重的脑震荡。所以他在讲课时，常常由于疲劳而头疼，要用手捂住后脑靠在黑板上休息一会儿，才能接下去讲。那时医药条件很差，更谈不上疗养。李老师就是这样以负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坚持讲课的。这种为了培养学生不顾自己健康而坚持教学的敬业精神，使我既敬佩又感动，受到很大教育。

李老师生活清苦，平易近人。当时他只一人在校（家属在沦陷区），自己做饭。我和同班同学常去他宿舍拜访他。他总是向我们谈些国外数学的新发展，还谈到群论、代数数论、超复数系（现称结合代数）、代数几何、拓扑学等等。我正是从李老师那里才初次听到很多数学分支的名称和内容简介的。后来他又借 Van der Waerden 著、肖君绛译的《近世代数学》（上下两卷）和肖君绛编著的《代数整数论》给我看。那是国内刚出版不久的新书，连校图书馆都还没有。我如获至宝，抓紧时间苦苦研读。但自己水平很低（当时只看过圆正造著、肖君绛译的《群论》上册约半本和吴在渊的《数论初步》），所以看得很慢，又不便久借，于是就挤时间抄写全书。至今我还保存着用土纸抄写的《近世代数学》上卷和下卷的一部分，那是 1946 年暑假花了约一个月时间抄成的。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笨功夫”，但在那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我由于那年暑假要动身来北京转学而未能把下卷抄完，但当时自己还是很高兴的，像是完成了一件大工程，然后就把原书奉还给李老师。他对我的“苦抄”也很惊讶，并加以夸奖。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李老师对我热心的课外指导

和雪中送炭式地慷慨借书，我那时就不可能对近世代数的一些基本内容有所了解，也不会得到后来进一步学习现代抽象数学的更大动力。

1946年冬，李老师由兰州返回北京，不久又转去天津北洋大学任教。同年，我由兰州转来北京师大读三年级，因而未能继续跟随李老师学习，这是一件很大的憾事。解放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李老师又由北洋大学转去南开大学。现在，退休后的李老师仍住在南开校园里安度晚年。

1980年，80高龄的李老师由天津来北京看望老朋友，也到师大来看看我，使我十分感动。我当即陪他老人家到各处走走，并看望几位老先生。当时李老师步履甚健，只是偶尔记忆力稍差。李老师那次还赠给我两卷他所珍存的 Hilbert 与 Bernays 合著《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上、下卷（1934，1939 原版）。另外还向我谈了他当年在莱比锡大学和 Van der Waerden 等人共事时的一些情况，我作了录音，至今珍存。

李老师的博士论文是古典代数几何方面的，题目为“Die 28 Doppeltangenten einer kurve vierter Ordnung”。文中系统地研究了曾由 Steiner 及一些后继者论过的亏格为 3 的 4 次代数曲线的 28 条双重切线的各种性质，补证了前人未能解决的各种情况，从而推进了 Steiner, Hesse, Salmon 及 M·Nocter 等人的有关论述。论文发表在德国著名期刊《Mathematische Annalen》第 118 卷（1941）中，受到代数几何学家 Zariski 等人的好评。

我因身体不佳，多年未能去天津看望李老师。1987年，我曾托我单位罗里波同志趁去天津开会之便代我前去看望他。1992年，南开大学胡国定教授来京时向我谈起：有一次李老师自己走去校医院参加体检，医生惊讶地问李老师何以未找人陪伴前来？李老师风趣地说：“我才 90 岁。”这件事传为美谈。这个“才”字，也道出了李老师老当益壮的豪迈精神！今年 6 月，我又托我单位孟晓青同志趁去津开会的机会代我前去看望李老师，知道他

老人家身体仍很硬朗，我感到非常欣喜。

李老师是世纪同龄人。我衷心祝愿李老师健康长寿！希望他老人家高兴地看看下个世纪新中国的更新面貌！

1994年7月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81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我最尊敬的徐老师

冯 铁 城

1986年春节，我携妻带子回海林市家中与父母亲人团聚。在闲谈中，母亲不胜伤感地告诉我：“你们的徐老师死了！在厕所里上吊死的，用破牛车将他尸体拉去火化的，可惨了！”我震惊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徐老师，我最为尊敬、最为佩服、才华横溢的徐云飞老师就这样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零零星星的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他是什么“日伪特务”，什么“反动军官”，“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云云。再后来我才得到一些确切的消息，徐老师年青时曾在伪警官学校读过书，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这段历史，给他加了许多罪名，横加迫害。由于他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非人折磨，故含冤走上黄泉路。

徐云飞老师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教历史课。他对人民的教育事业，对同学的高度负责精神，他那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广博渊深的知识功底及他那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自己和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甚至他的音容笑貌，一举手，一投

足，洒脱的风度都令我折服。在这37年后的今天我记忆犹新。徐老师的人格、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对我的思想、事业及成长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回想当年徐老师对我们教育的动人事例和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因而对徐老师的怀念是那样梦牵魂绕，令我激动不已。

1957年初春，北国的天气初暖乍寒。当时我在初三读书，迎考高中的复习准备已十分紧张，为能考上高中，我拼命的学习。我们几个小伙伴商定每天早晨天朦朦亮时，只要能看清书上的字，我们就回学校去学习。因为太早，学校大门还没开，我们就在前一天放学时偷偷打开走廊一头的一扇窗子的挂钩。第二天早晨我们将那扇窗打开，像“贼”一样爬进走廊。通常这时整条走廊很寂静、空旷，有点可怕；可是有一天，当我们从窗台上跳下来时，却听到一名男老师讲课的声音，稍一分辨我们就听出那是徐老师的声音。当时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他那深厚的男中音在这寂静的清晨显得那样洪亮，不时发出嗡嗡的回声。我们感到十分吃惊，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循声往各教室找，很快断定徐老师是在十二班教室讲课。我们几个人蹑手蹑足地走到教室门外，翘起脚，伸长脖子向里面张望，这时东方露出一丝晨曦，整个教室浸染在一片暗暗的桂红色的微明中。徐老师正站在讲台前对着整整齐齐排列的28张课桌讲课呢。讲桌上，课本、教案、粉笔盒摆放有致，黑板上挂着一张看不太清楚的历史挂图，他正用一根我们十分熟悉的半米多长的木制教鞭指点着挂图，他讲得很专注，很投入，也很激动，习惯地用左手扶着讲台，挥动着右手，做出有力的手势，还不时用左手掠起滑落在前额上的长发，黑板上用他那特殊的苍劲有力的方体书法不规则地写了一些字，有的画了圈，有的加了点，有的划了横杠，还画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箭头，由于光线不足，黑板上的字有些看不清楚。看来徐老师比我们来得还早，已经讲了好一会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很难相信他在这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对着28张没有生命的课

桌讲课。这时不知哪位小伙伴不小心弄响了教室的门，他才发现了我们，停止了讲课，并走向门口，向我们不好意思地笑了，请我们进教室当他的听众，又接着讲下去了，一直到这节课结束，并诚恳地征求我们的意见。看到这一切，我着实地激动了好一会，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课前的准备不只是停留在课本和教案上，还要进行这种特殊的“实战演习”。徐老师能有那样高超的教学艺术，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后来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对过去的情景我终生难忘。它时刻鞭策我对教育事业深深的爱，对成功执着的追求，对业务忘我地全身心的投入。

对徐老师的历史课，我们简直是崇拜至极。听他的课在当时对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就是难得的精神享受和心灵的陶冶，一节都不耽误。他为了激发同学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竭尽全力改革教学方法，设计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教具，在教学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徐老师讲《赤壁之战》的情景，在这37年后的今天我还历历在目。当时徐老师走进教室时只拿了一卷挂图、一根教鞭和几支粉笔，在一番简洁生动的陈述之后，将挂图挂上。那是一张自制的很普通的挂图，图上标明襄阳、江陵、乌林、夏口、武昌、紫桑、赤壁等地名，还画有长江、汉水等河流，当讲到曹军向刘备进攻时，徐老师的教鞭在挂图上轻轻一挑，立即翻出一个绿色的箭头，由襄阳直指江陵；教鞭再一挑，又出现一个绿色的箭头，由江陵指向乌林；与此同时刘备军队节节败退，随着徐老师的教鞭在挂图上跳动，出现两个蓝色箭头从襄阳指回夏口，反映出刘军退却的路线。当讲到孙刘联军向曹军反攻时，徐老师挑出一个特大的红色箭头由紫桑指回赤壁。随着这节课内容不断深入展开，一张普普通通的挂图却魔术般的出现了许多不同颜色的箭头，清晰地反映出赤壁之战的形势变化。我们简直是看呆了。这张挂图的设计与制造，可谓别具匠心，凝集了徐老师多少的心血和劳动。这张挂图在当时没有什么电教设备的情况下，可称是相

当先进了。

徐老师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每节课上课下课的时间掌握得特别准确，从不提前或拖后一分钟。他仪表、衣着总是那样有风度，一件黑呢上衣都磨得有些灰白了，仍然是那样洁净平整。他经常教育我们，衣服不怕旧，只要补好洗净就是好衣服……

徐老师的教育思想、教学态度和方法以及为人处事的品格，对我以后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回忆我走过的 33 年的教学生涯，开始时在许多地方是对徐老师简单的模仿，以后才逐渐形成我自己的风格，就是现在感到在教学上有些地方仍没有达到徐老师那样炉火纯青的程度。

徐老师虽然离开这个世界已经 26 年了，但他永远是我尊敬、最崇拜的老师，永远是我心灵的丰碑。

1994 年 9 月 20 日

(作者，黑龙江中学高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写作的启蒙者

——忆我的小学语文教师

石 英

6年前，我在以自己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学海征帆》中，写了主人公凌俊的高小语文老师文中武。他的“真实姓名”叫王中戊，除了作者为他代拟过一首诗稿外，几乎悉如本事。

“石恒基（我的原名），你多写作文吧，我看你在这方面是有前途的。”

这是我读五年级时，王中戊老师对我说过的话，至今仍遗声在耳。那是当他得知我父亲想叫我长大了经商之后，郑重其事地对我讲这番话的。经过几度曲折后，我终于走上了王老师40多年前希望我走的道路。

可是，他如今在哪里呢？屈指算来，他今年如健在，岁数并不很大，才68岁，还未到古稀之年呢。

当时（1945年），他可真是年轻，照今日的观点，才仅仅是22岁的小青年。但他性格沉稳，不苟言笑，微眯的眼睛里透着聪慧。据校长介绍，他在当时的北平读完高中后，回家乡度暑假赶上老母患病，加之战事频仍，津浦铁路中断，他回北平非易，便

暂且滞留在家。为了生计，他经人推荐，便来到我们这所全县有名的完小任教。

我记得他第一天来时，身穿蓝布长衫，黄白相间的皮鞋，短分头，衬着那白皙的面孔，便给人以气宇不俗的印象。他的口音我记不清了，也许是因我年岁太小分辨不出，大约是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吧。

在头几课中，他言语里渗透着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进取心就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在讲《詹天佑》这一课时，忆起他在北平读书时暑假去八达岭考察京张铁路的艰辛和地形的险峻，以衬托詹公当年付出的心血和劳绩以及非凡的贡献。他在讲一首诗时，强调朗读和背诵，牢记诗中的精髓。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低沉而浑厚的语调：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吾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

他在课堂提问过程中，逐渐地“发现”了我。每当一般地泛问或指名问别的同学无人回答或答不出时，他就非常自信地要我回答。说实在话，虽然我也有好胜心，但当着那么多同学每每将我突出出来，我总有些不好意思；却又不能因为怕冒尖，明明知道硬说是不知。当然因此而难免引起羡慕两种不同的反应。不过，王老师对我的信任与器重确在我的心底蓄蕴着很深的感情。每当他偶因生病或家有要事未能来上课时，我便会产生出一种缺憾以至怅然的心情。

然而，这不仅是我一己的感情用事，绝大多数同学以至家长都反映：“王中戊老师书底儿厚，教得好，人品也好。”

寒暑假他总要布置作业，大抵是每个同学开学时要交一两篇作文。我每次都是大大“超额”完成——写成像一本小刊物似的

整整一本，内中有散文、随笔、快板诗、人物特写等等，全是从具体生活感受中来的。而且是自己设计“版式”，自己编排，用毛笔抄写。开始是用自我姥姥家搜罗来的旧，账本翻过来加以装订；尔后又用解放区生产的“一面光”白纸抄写。王老师对我的这本作业既不过分赞扬，却又非常仔细地批阅，他要求十分严格，连“的”“地”用得不准的地方也勾出来。我记得他要求我写文章要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做到：流畅、自然、优美。我认为他对我的这一要求对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尽管我还没有达到他希望达到的境界。

我觉得，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某一位或几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如果他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肯定也有老师潜在的助力在。只是作为老师当时往往并没有意识到，多半出于一种天职，事后也不希图得到什么报偿。

我的王中戊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虽很年轻，但对个人的利欲非常淡泊。他就是想继续读书，想深造，所以在1946年暑假后，由于他老母故去，个人婚姻问题又与兄嫂发生矛盾，便毅然离开家乡再回北平。据说当时胶济、津浦路不畅，他是坐马车北上的。临别时我只见过他一面，他情殷依依，但话语不多，只是说：“我要去上大学，咱们后会有期。”这时他给我看他的一个硬皮大本，上面剪贴着他上高中时发表的诗文，约略有30首（篇）。我看了一下，觉得比较朦胧，不太容易理解，但印象还是很深的。在上述长篇小说《学海征帆》中，我在一个情节里代书中的“文老师”拟了一首新诗《白雪》：

……无数支银针，
抽吸着大地的绿液，
金水河畔的灌木，
蜷缩着干瘦的手指，
似在指点着什么，
却又意向不明，

万春亭旁的片松，
也变得色泽暗淡，
长青的松族，
难道也改变了习性？

.....

我的稚嫩的心灵，
正在拣拾着残留的绿意，
为把它奉献给明春，
浸润那飞来的种子……

王老师，假如你看到了我代拟的拙句，不会责怪我的唐突与不恭吧？

（作者，作家，现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

感谢我启蒙之师

丘 质 模

时光竟是这样无情，转瞬间就冲走了我半个世纪多的春秋；时光又是这样多情，它冲走了那么多显闻要事，却冲不走留在我脑中的大、中、小学老师的身影。每当我回首往事，我对我的老师总怀着一种不胜感激之情。无论在童稚时期或大学年代，我都非常幸运地有许多好老师。是他们，使我懂得怎样去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爱和奉献。孩童时代的师生情是最难忘、最亲切的。因此，我首先要将心底里最美好的鲜花献给我启蒙的曾老师。

我出生在粤北的一个偏僻山村，刚满6岁就到坐落在新殿庙的初级小学上学。老师是私塾出身，19岁就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开学那天，我坚决不肯上学去，是家长边拖边打把我送入小学的。因为在开学前，一个放牛阿哥对我说，学校的老师凶得很，你要是学不好，他就会用硬方木打手心，用藤条抽身体，甚至用针线把你的眼皮穿着吊起来……所以我对学校产生了一种莫大的恐怖感。

上学后，我处处提防着老师。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但我并没有受到老师的体罚，也没有看见哪个同学的眼皮被穿着吊起来，